

中国古代历史演义小说丛书

珍本



三国志演义

(上)

I242.43

8

:1

珍本中国古代历史演义小说

明·罗贯中 著

李卓吾 批评

董文成 校点

三国志演义
(上)

群众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北京

珍本中国古代历史演义小说

总 序

侯忠义

一、史传与历史演义

中国古代小说，源远流长，从题材上来说，可分为三大主流，即：神怪小说、历史小说、世情小说。其中历史小说，顾名思义，当指以历史史实和历史人物为题材的小说。

先秦时期的《穆天子传》，写西周穆王姬满，西游昆仑，会见西王母的故事，可以视作历史小说的萌芽。《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周考》、《青史子》等，可谓文言笔记体历史小说的开始。唐、宋、元出现的讲史平话，是历史小说的一大飞跃，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胚胎和雏形。元末明初，罗贯中创作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犹如一声春雷，宣告了历史演义的诞生。从此，历史演义就成了我国古代历史小说的主要撰构形式之一。

“演义”，又作“衍绎”，即“衍绎史传”之意。所谓“按鉴演义”，就是彰明按史实敷衍故事；书名又曰“通俗”，是表明文字等与史书的不同。由《三国志通俗演义》首先使用的“演义”一词，就体现了历史演义小说内容与形式上的特点。明·杨尔曾《东西晋演义·序》说：“一代肇兴，必有一代之史，而有信史，有野史，好事者聚集而演，以通俗谕人，名曰演义。”明·陈继儒《唐书志传·序》也说：“演义，以通俗为义者也。”明代著名作家袁宏道在《东西汉通俗演义·序》中，说了相同的意思：“文不能通而俗可通，则又通俗演义之所由命也。”这些话表明，历史演义无不标榜以“通俗”的形式来演义历史。其实这种“通俗”，是建立在对历史真实性极高要求的基础之上的，而史传正是演义小说内容上的主要依赖和根据。因此，明人把演义小说看作是可以“与经史并存”（陈继儒《列国志传·序》）的“羽翼信史”（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之作，把演义小说当成了通俗的历史读本。这一点，《三国志通俗演义》表现得最为突出。如果没有陈寿的《三国志》，《三国志通俗演义》便无从谈起。《三国志通俗演义》署“晋平阳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就说明了《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罗贯中自诩此书是从《三国志》演义而来。又如记隋唐间历史与人物的《隋唐志传通俗演义》，也明确宣布作者是广采史传编成的。林翰在其《序》中说：“遍阅隋唐诸书所载英君、名将、忠臣、义士，凡有关风化者悉为编入，名曰《隋唐志传通俗演义》。”至于冯梦龙《新列国志》

的成书,就更为典型。吴门可观道人《序》云:《(新列国志)》“本诸《左》、《史》,旁及诸书,考核甚详,搜罗极富,虽敷衍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而大要不敢尽违其实,凡国家之兴废存亡,行事之是非成毁,人品之好丑贞淫,一一胪列,如指诸掌。”肯定了据史传编撰演义小说的历史真实性。同时,也应当指出,成功的演义小说,它绝不是历史著作的重复和简单的移植,而是作者以自己的艺术才能进行的再创作。这表现在:精心剪裁、取舍材料,结构成首尾完整、脉络清楚的完整故事;增饰情节,细绘场景,渲染人物;将简练、质朴的文言文,改成群众化的通俗语体文等。当然演义小说作家的贡献远远不止这些,但它已充分说明,史传不等于演义小说,演义小说是对史传的再创作,也只有如此,才能满足读者对演义小说的审美追求。

二、历史演义的产生与发展

史传著作对历史演义无论从题材来源、结构形式、编撰方法,其中包括以人立传、按年记事的写法,以及精彩的语言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提供了借鉴外,其他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话本戏曲,都与历史演义有着因缘。尤其是讲史平话,它与历史演义都是从史著中滋生出来,可以说是同宗异派,由于话本成书在前,演义成书在后,演义又从平话中吸取了营养和借鉴。如在南宋说话艺术中,就有“讲史书”一家,“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

事。”(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平话小说是从说话中逐渐分离、独立起来的文人创作的讲史小说。鲁迅说:“宋人说话之影响于后来者,最大的莫如讲史。”(《中国小说史略》)并认为:“后之章回小说如《三国志演义》等长篇的叙述,皆本于讲史。”(《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应该承认,讲史平话小说对历史演义影响巨大,它们简直就是最初的章回体小说。表现最明显的,莫过于《三国志通俗演义》。《元刊全相三国志平话》就是它的雏形。

《三国志平话》近六万字,到《三国志通俗演义》已达八十多万字,不仅作品的真实性大大提高了,内容无疑也更加丰富。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准确地比较了两者之间的重要区别说:“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若东原罗贯中以平原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三国志通俗演义》不过是删除了《三国志平话》中的荒诞不实之处,却无法否认《平话》与《演义》之间的联系,和《平话》对《演义》成书所做的贡献。如《三国志平话》共有六十九节插图标题,其中有二十八节为《演义》直接吸收。《平话》已有了统一的连贯情节,这便是《演义》的情节基础。《平话》中的主要人物诸葛亮、张飞、关羽、刘备、曹操,仍然是《演义》中的主要人物。如《演义》保留了《平话》中诸葛亮神机妙算、足智多谋的一面,尽量削弱其鲁莽刚武、

仙风道骨的一面,使之更接近历史人物。《平话》中的主要情节,主要是写刘、曹集团的矛盾和斗争,以颂扬刘、关、张为主,很少写到东吴。《演义》通过进一步的构思,在《平话》的基础上,增加了大量有关东吴的内容,使魏、蜀、吴三家军事力量与矛盾斗争,得到了充分、均衡地反映。特别是《演义》突出了曹操的形象,是一大进步。同时,《演义》接受了《平话》的爱憎倾向。《平话》在流传中带来的强烈的是非感、爱憎感,以及幽默诙谐的格调等,都为《演义》的创作提供了基础。又如《前汉书平话续集》之与《两汉开国中兴传志》、《武王伐纣平话》之与《列国志传》,都可以明显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列国志传》的前两卷,主要沿袭《武王伐纣平话》的细节描写,神魔怪异色彩十分浓厚;而对战争场面描写,又具有明显平话风格。如艺术上全用白话描摹,比喻形象、生动,音韵抑扬顿挫,节奏感很强等,就是保持了平话的特点。至于平话中的分卷立目的形式,用作评论的诗赞韵语,都为长篇章回体演义小说的最终形式,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毋庸置疑,元末明初是从讲史平话向演义小说的蜕变时期。演义小说的创作始于罗贯中。他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对演义小说的创作,无论内容与形式都起到了典范的作用。罗贯中是一个多产的作家,除《三国志通俗演义》外,尚编有演义小说《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十七史演义》等。明代中期,在《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影响下,随着经济的发展、思想的活跃、科技的进

步、印刷事业的兴盛，演义小说的创作一片繁荣。正如吴门可观道人在《新列国志·序》中所云：“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汪洋百余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顰日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几与正史分签并架。”林翰在《隋唐志传通俗演义·序》中也说：“罗贯中所编《三国志》一书，行于世久矣，逸士无不观之。而隋唐独未有传志，予每憾焉。”强调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开创之功，并把《隋唐志传通俗演义》看作是踵武《三国志通俗演义》之作。

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接着产生了模仿罗氏之作的演义小说《列国志传》（余邵鱼）。此书以武王伐纣为开端，记叙春秋列国故事，体例、风格绝类罗贯中。余氏对演义小说的精刊与倡导，鼓舞起书贾的热情和读者的兴趣，而文人亦以创作此类小说来寄托各自的情怀，于是掀起了一股演义小说创作热。明中叶嘉靖至万历前后，新创与改编的演义小说不下二十余种，蔚然成风。比较重要的，有熊大木《南北宋志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甄伟《西汉通俗演义》，谢诏《东汉演义传》、《全相按鉴演义东西汉志传》，无名氏《承运传》，杨尔曾《东西两晋志传》等。明末至清中叶，是演义小说创作的又一高潮时期，且作品出现了系列化的趋势。明末补订和续作的有冯梦龙《新列国志》、吴门啸客《孙庞斗志演义》、徐震《乐田演义》（即《前后七国志》）；取近事加以敷衍的

如《英烈传》、《续英烈传》。而补缺之作，如周游的《开辟衍绎通俗志传》、钟惺（伯敬）的《盘古至唐虞传》、《有夏志传》、《有商志传》，以及清人杜纲的《南史演义》、《北史演义》，吕抚的《二十四史通俗演义》等。清中叶以后演义小说的沉寂和衰微，与当时的政治形势与文化专制有关，但近代出现了蒙古贵族尹堪纳希所撰元朝勃兴历史的《青史演义》，清末陆士谔反映清代全史的《清史演义》等。古代的历史演义小说，几乎涉及了整个中国社会全部朝代和重要史实，简直就可以构成一部中国历史的“形象”教材。“五四”以后，作为古代历史演义小说的余响，尚有新作出现，如蔡东藩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钟毓龙的《上古神话演义》、许啸天的《唐宫十二朝演义》、李伯通的《唐宫历史演义》、林汉达的《东周列国故事新编》等。

三、历史演义的特点

以《三国志通俗演义》为代表的历史演义小说，从它诞生之时起，就已经基本形成了区别其他历史小说的类型特征，这些特征表现为：内容的真实性、语言的通俗性和形式上的章回体。

内容的真实性，体现了演义小说反映历史的可靠性和合理性。正如明代高儒在《百川书志》中评《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时所说，是“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尚好，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

陈叙百年，该括万事。”演义小说并不排斥虚构，但它的主要情节却是从史实出发，历史的纪实性，远远超过了作者的想象和虚构。也就是说，历史演义的作者的想象是有限的，虚构是受历史制约的，只能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适当地运用集中、夸张、熔裁等艺术手段。作者的态度是冷静、客观的，对人物的刻画和褒贬是以历史为根据的。由于小说的情节是以历史时间为线索，所以即使是细节的渲染和增饰，亦与历史的真实时间相符。历史演义题材上的这一基本特征，使它与以虚构为主的记人物传记的英雄传奇小说，如《水浒传》、《杨家将通俗演义》、《隋史遗文》等明显不同，后者是属于历史小说的另一种类型，这是应该加以说明和区别的。

历史演义小说保持着通俗特色。通俗之意，一方面表示演义小说浅显易懂，文字通俗晓畅，精炼优美；一方面还要求作品内容具有移人性情的作用，富有艺术感染力。正如甄伟在《西汉通俗演义·序》所说：“（演义小说）虽俗而不失其正，义虽浅而不乖于理；……使刘、项之强弱，楚汉之兴亡，一展卷而悉在目中，此通俗演义所由作也。”正由于演义小说不仅“据正史”，还要“采小说”、“野史”，即吸收传说逸闻，以补正史之不足，这种带民间色彩的内容本身，就产生了“通俗”的作用，丰富了“通俗”的内涵，这是演义小说不容忽视的特点。

《三国志通俗演义》首创古代小说长篇章回的体裁。历史演义所采用的章回体，是在平话和史传两方面影响

下形成的。“讲史”由于内容丰富，人物众多，情节复杂，势必要分回讲说；平话作为书面形式的读物，也就按照古代图书的形式，分卷分篇叙述。通俗演义保留了这个特点，以此作为“通俗”的特色之一。另一方面，章回体的形成也和编年体、纲目体等史著体裁有一定的关系。小说中的分卷、分回，其作用与史书按年分卷标目，是完全相同的。章回体的叙事模式，打破了平话单线发展的情节结构，而采用了头绪众多的叙事模式，无疑是我国古代小说艺术上的一个进步和发展。

至此，我们对历史演义小说的概念，可以下这样的界定：

一、以叙一朝或几代的历史为主要内容，多以正史编年为序；

二、以帝王将相为主要人物，以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为主要情节；

三、成书过程为世代累积型，大都有所借鉴和依托；

四、采用长篇章回体体裁，编年与纪传相结合的叙事方法；

五、叙述语言多用文、白相间的浅近的文言，人物对话也偶用白话。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对历史演义的界定，是对这一小说类型的特点归纳、综合的结果，并不是说每一部历史演义都具有上述的特点；同时，也不能把这些类型特点绝对化，看成是一成不变的框框，某一类型可能被突破，不同

类型之间也可能互相影响。我们这些意见，目的只在于帮助读者了解和认识这一类型的作品而已。

四、历史演义的艺术与价值

修髯子在谈到《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用与影响时说：“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非通儒夙学，展卷间，鲜不展思困睡。故好事者，以俗近语，隐括成编，欲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作为形象的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普及历史知识的同时，也产生了相应的教育作用。史传的目的在于“资治”，演义的目的在于满足人们的审美追求。演义小说也是艺术。在“衍绎史传”、不违背历史真实的情况下，对历史人物的描写刻画，对历史事件的敷衍润色，成为判断演义小说艺术水平高低的重要依据。“其描写摹神处，能令人击节起舞。即平铺直叙中，总属血脉筋节，不致有嚼蜡之诮。”（《新列国志·凡例》）历史演义小说同样不能漠视作品所应有的愉悦功能和读者的审美期待。

我们本着这个目的，编辑了这套《中国古代历史演义小说丛书》，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欢迎。

一九九五年岁末，
于北京大学燕北园。

前 言

《三国演义》是中国长篇小说的鼻祖，是历史演义小说中空前绝后的典范。在它出世后的六七百年间，世世代代的读者对它着迷不已，它以惊人的艺术魅力影响着我们民族的生活、思想、文学、艺术、历史、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社会生活领域，渗透到当代文化的众多学科，对民族性格的成长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在中国小说史上，它开辟了长篇小说繁荣的新时代，是中国小说艺术进入真正成熟期的伟大里程碑。中国晚明时代最负盛名的通俗文学巨子冯梦龙，综观有明一代名作如林的小说园地，以非凡的眼光选优拔萃，精辟地把“四大奇书”的盛誉归之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四部长篇名著。（李渔《两衡堂刊本三国志演义序》）这一品评，以其无可争议的权威性，得到后世论者的一致认同。今天，这“四大奇书”都成了举世公认的世界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目

前已有十几种文字的外文译本，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读者越来越多。自70年代以来，三国文化旋风横扫日本全国，上百个“三国谜”团体活跃异常，有关三国的形形色色的出版物都十分畅销，使出版商大发其财。这一现象表明，走在世界现代化前列的经济大国日本，并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为了迎接未来更加严峻的世界性竞争与挑战，他们发现中国的史书《三国志》和小说《三国演义》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谋略宝库和智慧之泉，人人都想从中找到成功的秘诀，从中获取为人处世乃至经营谋略方面的教益与启示，从而使日本的“三国热”盛况空前，一再升温。聪明好学的日本朋友，总是从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中挑选最有价值的成果为自己所用。因此，日本的“三国热”值得我们这些《三国演义》故乡的炎黄子孙们深思：要不要在研究、挖掘和发扬“三国”智慧宝藏方面，同日本友人来一番竞赛呢？看来，竞争不可回避。如果我们不自觉迎接挑战，必将被动挨打，再尝“墙里开花墙外红”的遗憾苦果。从事着改革大业的中国人，理应巧借三国智慧的东风，使祖国的发展进步更加迅猛而顺畅，只有这样，才无愧于我们祖先的天才创造和殷切期望。

《三国演义》成书过程长达千年之久，也许是世界上孕育和创作周期最长的一部小说了。在元末明初罗贯中写成小说《三国演义》以前，三国题材的史学、文学创作和民间传说早已开始兴起，而且长盛不衰，孕育着集大成的三国题材宏伟巨制《三国演义》的胚胎。其中较早的是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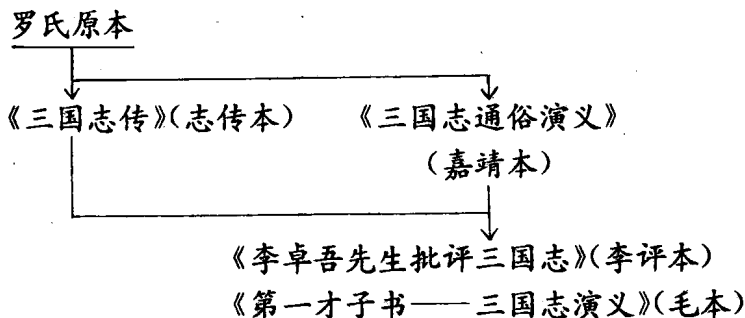
批三国史著作,主要有: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及南朝宋时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南朝范晔的《后汉书》、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以及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南宋朱熹的《通鉴纲目》等;民间传说则从三国当时就开始了,此后不断在民间流传发展,在此基础上,由民间不知名的说唱艺人或下层文人编写成民间口头文学作品,如:关于《花关索传》的四集说唱词话故事(《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之一),元至治刊本《三国志平话》、《三分事略》等;文人涉足三国题材较早的文学作品是诗词,其次为戏曲,后者有金院本、宋元戏文,特别是大量的元杂剧。上述大量书面或口头的三国文学遗产,成了元末明初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的主要素材宝库,再加上其他文献和现实生活中的素材源泉,是罗贯中成功的前提条件。

现在的中国小说史家一般都认定罗贯中是《三国演义》的作者,或称“最后写定者”。而关于这位作家的生平,资料奇缺,明初贾仲明在《录鬼簿续编》中的简短记载,是迄今发现的最早、最可靠的惟一资料:

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
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
对这段文字的理解不同,又引起对罗贯中生平的分歧看法。这段资料肯定了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人(据贾仲明生卒年推测);其次谈了罗贯中是个有文学才能的人;第三点是关于他的乡贯和号。不少人对“太原”理解为今山西太

原,但这样理解同传世诸多明版《三国演义》的作者题署“东原罗贯中”矛盾。据杨海中在1995年第四期《东岳论丛》上发表的文章,他认为,罗贯中的籍贯非山西太原,而是山东之太原,其地在济南西南长清一带(据《宋书》、《魏书》、《隋书》、《长清县志》),与东原本是同一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所用的不同地名。这一理解比较可信。据明弘治甲寅(1494)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称,罗贯中名本,字贯中。明王圻《稗史汇编》称其“有志图王”。有罗贯中署名的著作,包括杂剧三种,小说六种:《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唐两朝志传》、《小秦王词话》、《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三遂平妖传》等。

《三国演义》是近人习用的简称书名,其原稿书名今已不可考。今存最早刊本明嘉靖本题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是最接近作者原稿的刊本。但据近年来新的研究成果,此说受到了新观点的很大冲击。如主持编写《三国演义辞典》的沈伯俊就认为明万历年间开始刊行的多种《三国志传》,内容与嘉靖本有所不同,文字也较质直,其祖本当早于嘉靖本,可能这些《志传》本的面貌比嘉靖本更接近罗氏原本。沈伯俊在其校理本《三国演义》的前言中明确指出:“志传本的祖本比较接近罗贯中的原作,甚至可能就是罗氏原作(当然,不同的志传本的刻印者可能都有所改动);而嘉靖本则是一个经过较多修改加工,同时又颇有错讹脱漏的版本。”《三国演义》的版本系统可用下表说明:



当前最流行的是第四代版本《三国志演义》即清初毛宗岗修订本。以前学术界比较重视《三国志通俗演义》(即嘉靖本)的版本价值,而忽视了《三国志传》(简称“志传本”)和《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简称“李评本”)的地位。

本书根据清初吴郡绿荫堂复刊明建阳吴观明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校点,全书一百二十回,不分卷,每回又分两节,各系标题,全书共二百四十节。此书卷首有“江上缪尊素”所写《三国志演义序》,说明已开始用《三国志演义》这一书名,但总目和中缝则题为《三国志》。《三国志演义》似由嘉靖本书名删去“通俗”二字演化而来,《三国志》则为《三国志传》书名删去“传”字,与陈寿史书《三国志》同名相犯,只为简便,用于中缝题款,而不宜单独作正式书名。由这些异名,也反映了此本的渊源关系。此本的评语是明万历年由无锡人叶昼所写,伪托“李